

试卷糊名的由来



资料图片

在现代考试中,为防止考试作弊,往往采取严格的试卷处理办法和阅卷办法。其中之一就是要求考生将姓名等信息写在密封线内。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常识。这可以使阅卷人在批阅时不知道考生的个人信息,防止作弊。其实,试卷密封源于我国唐代。据《隋唐嘉话》记载:“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,乃令试日自糊其名,暗考,以定等第判之。糊名,自此始也。”

不过武则天所创的糊名之法,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,还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制度。到了宋代,“糊名”才正式用于科举考试,称封弥,元朝以后叫弥封,明清一直沿用此法。

宋朝时,曾有人击登闻鼓(有冤抑或急案者可击朝堂外悬鼓,以鼓上闻,从而成立诉讼)投诉科举评阅试卷不公,后来,陈靖上疏,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之法。宋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,召集朝中大臣商议后,开始在殿试中使用糊名法。从此,糊名法不但成了殿试的定例,还被逐步推行到各级常科考试中去,成了古代考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。

“糊名”的具体做法是将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、籍贯封住,防止评卷者徇私舞弊。

自从密封试卷实行以来,既有拥护者,也有反对者。就拿宋代来说,拥护的人有包拯、欧阳修等,反对的人有范仲淹、苏颂等,他们各执一词,述说密封试卷的利弊。事实证明,密封试卷,是保证

考试公平的一项有力措施。

仅举三个古人诗文中记载的事例,来说明密封试卷在考试中的必要性。先拿宋代的两个事例来说,一个是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的,另一个是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中的,最后一个是在清代诗人樊增祥的叙事诗《水烟袋歌》里的。

宋仁宗时,国子监有个学生叫郑獬,有才气但又自负,对国子监选拔考生时把他排在第五很有意见。按照惯例,考试结果公布后,被录取的学生要向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写信致谢,在感谢信中,郑獬不但对自己名列第五牢骚满腹,还把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、挡路的顽石,把自己比作埋没的千里马和巨鳌。国子监祭酒看后非常生气,从此衔恨在心。

皇祐五年(1053),郑獬通过会试后参加殿试,主考官恰恰又是那位国子监祭酒。这位主考官极力要让郑獬落榜,以报其当年的不逊之仇。当他看到一份试卷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时,立即将该考生淘汰了。但当阅卷完毕拆封以后,发现那份卷子根本不是郑獬的,而郑獬偏偏中了当年的状元。

另一件就是苏轼意欲录取李廌而未果的事情了。我们知道,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,深得苏轼的赏识。元祐三年(1088),苏轼主持省试时,认定有份卷子李廌的试卷,就在试卷上大加赞扬,还对同为考官的黄庭坚吹嘘道:“是必吾李廌也。”并将其定为了第一名。可等拆号一看,他录取的不是李廌而是章

援,李廌却名落孙山。

最后再说一下清代诗人樊增祥在他的叙事诗《水烟袋歌》里记载的一件考试乌龙事件。同治年间的状元陆润庠与湖南李拔贡是好友,有一次,在酒桌上,陆润庠安慰落榜的李拔贡:“湖南乡试,要是我做考官,包你中举。”李拔贡请示关节(暗号),陆润庠正吸烟,就说:“把‘水烟袋’三字嵌入试帖就行。”没过多久,陆润庠果然成为湖南乡试副主考,写信给李拔贡,特意提醒:“颇忆‘水烟袋’否?”李拔贡欣喜若狂,收好信就雀跃而出。老婆见丈夫形迹可疑,苦于不识字,就把这封信带回娘家去参详。李拔贡还有两位连襟,也参加此科乡试,因此沾光受益。其中一位将“水烟袋”三字嵌入试帖最为自然,“烟水苍茫里,人才夹袋储”,得到较高的名次。李拔贡被两位连襟挤到副榜第一名的位置,空欢喜一场。

既然试卷糊名能有效避免作弊,为什么还受到范仲淹、苏颂等人的反对呢?其实,持这种反对观点的人古今都有,他们认为,只看试卷优劣而不看平时德才,这样并不全面。但正像包拯反驳范仲淹的话: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,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,他们“或缘其雅素,或牵于爱憎,或迫于势要,或通于贿赂”,很容易做出不公的事情。所以,要想维护考试阅卷公平,试卷密封势在必行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揭秘

值得借鉴的古人读书方法

读书,可以明理、明智和明心。古代诸多名家学者都有自己的读书之法。

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主张读书要做到“五要”。一要天天读,蒲松龄自己订了一个本子,每天清晨起床后,就在本子上标上一天中要读什么书,写什么文章。如果日期下面出现了空白,他就会愧疚万分。二要夜夜读,蒲松龄白天要忙于生计,夜里经常是一卷书、一盏灯,埋头苦读到深夜。三要老年读,蒲松龄晚年,发白、耳聋、齿脱,但眼睛尚好,遂经常翻书阅读。蒲松龄在诗中写道:“仅目一官能尽职,翻书幸足开心情。”他在《寂坐》诗中还写道:“平生喜推书,垂老如昔狂。日中就南牖,日斜随西窗。”四要抄书读,蒲松龄在毕家教书30年不愿离去,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毕家书多,可供他抄读。五要分类读,蒲松龄把书分成精读、泛读两类,要有区别地读。有的书了解大意,有的书要反复诵读,不断玩味,读通为止。他在诗中写道:“读书析疑如滤水,务使滓尽清澈底。”

朱熹读书则以“体会、循序、精思”为法。关于体会,朱熹说:“为学读书,须是耐心细意去体会,切不可粗心……去尽皮,方见肉;去尽肉,方见骨;去尽骨,方见髓。”关于循序,朱熹说:“以二书言之,则先《论》而后《孟》,通一书而后及一书;以一书言之,则其篇章之句,首尾次第,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。”关于精思,朱熹说:“大抵观书须先熟读,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;继以精思,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,然后可以得尔。”

韩愈读书讲究“提要钩玄”,旨在抓要点,明主旨,以便直探本原,提取精粹内容。韩愈勤于读书,注重方法,他在《进学解》中说:“记事者为提其要,纂言者必钩其玄。”

陶渊明读书,主张抓住重点,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。明代杨慎说,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,是不为两汉以来经书中的繁琐考证所左右,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。

苏轼读书讲求“八面受敌”。这里的“八面”,是指书中各个方面的内容,形象地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八方,然后各个击破。苏轼在《又答王庠书》中说:“少年为学者,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。书富如入海,百货皆有,人之精力,不能兼收尽取。故愿学者,每次作一意求之。”苏轼把好书比作知识的海洋,内容十分丰富。每读一本好书,每次可只带一个目标去读,需要读好几遍,日久天长,必有所获。

郑板桥读书“求精求当”,“求精”即读书要有选择,选好书,读精品;“求当”就是恰到好处,适合自己的水平和需要。郑板桥曾说:“求精不求多,非不多也,唯精乃能运多。”“当则粗者皆精,不当则精者皆粗。”事实上,郑板桥并不反对博览群书,只是强调必须以精读为基础。

古代名家学者这些经典的读书方法,在今天看来,仍然值得我们借鉴。

卜庆萍

历史短波

盘点宋朝的“严母”

宋朝是我国古代盛产“严母”的时代,严父的故事不突出,严母的事例却是不胜枚举。

宋代,许多母亲已经认识到溺爱孩子的后果。司马光的母亲就曾经说过:“作为人母,不患其不慈,而患其只知爱而不知教。古人说得好:‘慈母败子’。爱而不教,使子女成为大奸大恶之人,甚至被判刑、杀头,这不是别人唆使的,正是母亲纵容的结果。”

另一位政治家、诗人寇准也有一位严母。寇准小时候喜欢玩飞鹰、走狗,被严厉的母亲用秤砣砸伤脚面,“中足流血”。这一砸,让寇准幡然醒悟,从此开始发奋苦读。做了宰相后,寇准还常常抚摸着脚上的疤痕,哭念

母亲。

宋代,地位的提高,使许多母亲读书识字,有能力督促孩子学习。苏轼的父亲苏洵常年在外出游历,母亲程氏自然就担负起了教导苏轼读书的任务。有一天,母子俩读东汉《范滂传》,苏轼对母亲说:“我想做范滂这样的人,母亲答应吗?”程氏说:“你能做范滂,我怎么就不能做严格教子的范母呢?”

在宋朝,家中地位尊贵的母亲,性格也更严厉,对儿子要求也更严格。一门出了两个宰相、一个将帅的陈省华一家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。进士出身的陈省华无暇顾及3个儿子的学习,教育儿子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夫人冯氏的身上。于是冯氏便一手握棍,一手持香,夜夜

陪读。“二十四孝图”中的“冯母烧夜香”,说的就是冯氏陪读的故事。至今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大桥镇东北方一个天然岩洞中,还残存一块小石锥,这就是陈家3个幼子“头悬梁锥刺股”、刻苦读书的地方。

正是在冯氏的严格教育下,其子陈尧叟、陈尧咨相继于宋太宗端拱二年(989)己丑科和宋真宗咸平三年(1000)庚子科考中了状元。陈尧叟、陈尧佐后来都官至宰相,陈尧咨则被任命为节度使,在军中镇守一方。另外,南宋士大夫楼钥的母亲汪夫人,“庄重有家法”“教子甚严”,也是宋代严母的典范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